

## 语用学转向的表达及其对语言学突围的作用〔\*〕

○ 沈贤淑

(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语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语用学直接将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和具体的语境结合在一起,从而很好地契合了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特征,从哲学的意义上摆脱了对语言研究仅注重词汇和语法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研究方法。语用学转向源自于语义分析哲学的缺陷导致的哲学和语言学上的困境,这一困境的产生源自于语义分析哲学对逻辑科学的过度依赖。语用学转向通过强调具体的整体语境对语义分析的影响,克服了语义分析哲学的局限性,使语言学成功地从语言分析哲学的困境中突围。在这一过程中,以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语言哲学的发展对语用学的转向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并在对科学的解释、指称理论、真理观以及意向研究等语言学领域产生了突破性的影响。

〔关键词〕语用学;语用学转向;哲学;语言学;语境

语用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以语言的实际意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专门研究在特定语境中话语的具体语义,即在不同的语境下特定的话语应当如何理解及使用,以及其如何影响人运用和理解语言。迄今为止,语用学的定义和范畴并没有在语言学界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其研究的核心是语境对语言交际过程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却是得到人们公认的。语用学直接将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和具体的语境结合在一起,从而很好地契合了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特征,从哲学的意义上摆脱了对语言研究仅注重词汇和语法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研究方法。语用学转

---

作者简介:沈贤淑(1961—),博士,延边大学朝鲜-韩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朝汉语言对比、韩国语教育。

〔\*〕本文是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语复合词与朝鲜语复合词对比研究”(编号:[2013]59)和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朝复合词对比与教学研究”(编号:2014WY28)的成果。

向不仅是现代哲学发展在语言学领域的表达,而且为语言学突围提供了新的契机。<sup>[1]</sup>但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学者在引进语用学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语用学对语言研究的作用,而很少关注其产生与发展同现代哲学发展的联系,也没有从语言学发展的整体角度来分析语用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以下即从分析语用学转向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出发,指出语用学转向对语言学突围的影响及其具体表现,以及从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阐述语用学转向的重大意义。

## 一、语用学转向与哲学的关系

语用学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现代哲学发展对语言学发展影响的主要表现。因此,分析语用学转向和现代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无论对研究语用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还是分析语用学转向的真正原因,都能起到根本性的诠释作用。

### (一) 现代哲学的发展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

20 世纪初现代哲学领域最关键的一次转向,是以对语言的研究替代之前对认识论的研究作为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课题,哲学关注的基本对象由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向为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人们通过研究语言的意义、本质、理解及交流等方面的内容,将对语言的各方面的认知提高到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高度,而不再将知识的起源、认识能力和限度等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包括以下一系列因素。首先,现代逻辑技术的出现,使人们终于能够通过形式语言的基础上以逻辑推演的方式对语言进行分析,从而为整体而系统处理哲学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出现且在实践中被验证,使科学理论同人们的日常经验渐行渐远,客观真实越来越形式化和抽象化,而且存在于经验无法感知的微观世界之中,只有科学理论才是真实存在的具体表现。再次,人们发现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其根源还涉及到具体的语言表达和解释的问题,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发展,成为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有必要将科学理论以及语言统一,对所有知识领域进行符号化和量化的推广和演绎,以保证符合现代逻辑理论要求的普适性、统一性和自洽性。因此,现代哲学的发展导致的逻辑和语言的结合,使语言学研究从之前的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的根源在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对科学理论的描述和解释带来意义上的混乱,必须实现语言和科学逻辑的一致,亦即实现其精确化或科学化。因此,现代哲学向语言学转向,直接促成了语言学自身的转向。<sup>[2]</sup>语言学转向的典型表现是哲学上的语义分析方法的出现,其统一了科学知识和哲学理性,使得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认识论与本体论、现实和可能、实在意义和指称概念等,通过语义分析的方法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 (二) 语言学转向的哲学缺陷与语用学的产生

语言学转向产生的语义分析方法虽然通过现代逻辑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

然语言的歧义和模糊同科学理论要求的精确性之间的矛盾,但却因此导致了严格要求逻辑理性的形而上学或科学主义的问题,因此存在一系列严重的缺陷:

### 1. 过度夸大了语言对人类发展的作用

语义分析方法将哲学的中心问题归结到语言的语形和语义方面,表面上避开了某些哲学上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比如本体论方面的争论。但是,其却将对知识中逻辑关系的发现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本质,将哲学的基本任务视为使用符合逻辑的科学语言进行分析,将哲学简单化为“科学的逻辑”,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的作法,其仅仅是避开而并没有解决哲学上存在的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

### 2. 孤立地对知识进行静态分析

逻辑分析方法对科学理论进行的分析,只是孤立地对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静态分析,脱离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忽略了社会结构以及心理因素等产生的影响。

### 3. 以机械的科学主义作为逻辑理性的标准

语义分析方法以逻辑理性为标准,认为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应当按照所谓的科学主义逻辑进行描述,从而导致狭隘的机械式的科学中心主义。正是因为语义分析哲学导致的上述语言学转向上的缺陷,哲学家们不得不寻找解决这些缺陷的途径,于是就寻找到了语用分析方法,从而导致了语用学这一学科领域的出现。<sup>[3]</sup>

语用学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不是语义分析方法要求的严格的逻辑科学导致的结果,而是与诞生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实用主义哲学讲究具体事物在现实社会中具有的实际效果,而虽然不排斥形式和逻辑过程,但并不将其作为最终判断标准,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语义分析哲学过度对逻辑科学的过度依赖。“语用学”一词是由和新康德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皮尔斯等人最先提出。事实上,英语中的“语用学”的表达方式为“pragmatics”,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实用主义哲学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语用学,将语言的使用者和接受者以及具体语境等综合起来考察,关注的中心是具体的阐述和经验世界,重视人的主观体验和外在活动对语义的影响以及自然语言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语义分析方法过度强调逻辑和科学的形而上学以及机械主义的弊病。

## (三) 语用学转向的哲学基础

语用学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语义分析哲学存在的一系列缺陷,而其理论来源则是盛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其哲学基础主要是实用主义哲学和语义分析哲学。

### 1. 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具体事物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果,在实用主义哲学指导下实现的语用学转向,解决了语义分析哲学纯逻辑主义导致的形而上学的缺陷,使语言与具体使用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如语用语境、语用推理、语用

规则、语用逻辑、语用过程等成为哲学、语言学、逻辑学乃至符号学等领域研究的重点,从而使语用学成为了所谓的“经验主义语用学”。<sup>[4]</sup>这进一步完善了语言分析的具体技术,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概念和技术上的哲学基础。

## 2. 语义分析哲学

随着 20 世纪初现代哲学的转向而出现的语义分析哲学,其以逻辑科学为语言分析的核心工具,力图对自然语言存在的歧义和模糊进行符合科学理论表达的精确化改造,通过对语言外在表现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进行逻辑分析,理解隐藏在语言背后的准确含义。虽然其在实践中出现了逻辑和科学至上的形而上学的缺陷,但其却创造了以语言作为分析具体知识基础的研究方法。在其遇到现实中的困难的时候,从语用的角度来解决这一困难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sup>[5]</sup>因此语义分析哲学成为了语用学转向的批判对象和根本原因,是与其相对照的哲学基础。

## 二、语用学转向对语言学突围的影响

通过对语义分析哲学秉持的逻辑和科学至上所导致的实践中形而上学的批判,语用学转向强调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不仅在以科学为导向哲学领域树立了一种新的同日常生活更加紧密结合的语用思维,而且为语言学的突围找到了方向。随着语用学的发展,语用学已经成为当代语言思维解释和发展的基本平台。其中,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两者则分别按照英美和大陆哲学的传统,通过语用学转向对语言学突围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 (一) 哲学的发展和语言学的困境

真正促使现代哲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由语义分析哲学完成语用学转向的,是以批判语义分析哲学的姿态出现的日常语言哲学,其认为语言学研究已经陷入过于强调人工语言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从而同现实社会脱节的困境,必须通过语用学的转向,使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从如何构造符合逻辑科学的精确人工语言转向自然语言,使其同日常生活相结合,摆脱其同实践脱节所导致的形而上学困境。秉持这种思想的代表学派是诞生于语言分析哲学后期的英国牛津日常语言学派,这一学派通过对语言分析哲学所具有的科学和逻辑至上原则的批判和分析认为,真实的语义往往包含在人们的交际意图之中,言语只是表达个体思维的工具,必须将人们的交际意图与言语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其在特定的语境中所表达的真实语义。<sup>[6]</sup>其认为以语义分析哲学为指导的语言学存在以下问题:

#### 1. 语言观上的困境

语义分析哲学学派认为自然语言因为其歧义和模糊的特征,不利于对科学理论进行精确表达,因此,严格按照科学逻辑创造的人工语言由于其精确性,有着自然语言难以比拟的优势。这从本质上是采用原子主义的研究方法,将语言包含的意义局限于科学逻辑。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则指出,自然语言事实上在表意方面并不比人工语言存在所谓的劣势。由于其完全脱离社会的影响而纯粹

由逻辑科学构建,人工语言固然具有表面中性的特点,对于语义的形式性表达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其仍然是特定的人群,主要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等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制造的描述工具,因此其实质上必然带有人为干预的特征,而不是纯粹中性,虽然程度不同,其依然会产生自然语言具有的歧义和模糊的问题。而人工语言存在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其主要工具的公理定理等所谓的科学理论,事实上只是人类语言需要表达的意义的一部分,远不能包括人类语言意义的全部。<sup>[7]</sup>而自然语言虽然受限于其产生群体,从而存在相应的价值倾向,但却涵盖人类语言需要表达的各个方面。因此,语言分析哲学在科学理论描述方面否认自然语言提倡人工语言的同时,也使人工语言仅仅适用于表达科学理论的困境暴露无遗。

## 2. 方法论上的困境

在方法论上,语义分析哲学力图通过创造一种完全符合逻辑科学的完美的人工语言,以实现对语言意义的精确描述,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即是这一方法论的典型代表,其著有这方面的代表作《逻辑哲学论》。这种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使其陷入对各种逻辑科学的过度依赖。而在现实世界中,很多社会现象并不具有数理科学所需要的严格的逻辑关系,如人的主观感受。事实上,同各种复杂具体语境相结合的现实语言,根本不可能对其进行所谓精确而科学的描述,从而使其适用只能严格限定于逻辑科学领域,产生应用范围过于狭窄的困境。

正是由于语言分析哲学对数理逻辑科学的过分强调,导致其无法表达同逻辑科学无关的其他人类现象,仅仅适用于表达科学理论,从而产生语言观上的困境。与此同时,语言分析哲学所使用的数理逻辑分析工具,对无法通过精确而科学的社会现象的语义表达无能为力,从而产生方法论上的困境。语义分析哲学的上述困境的存在,使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更为重视自然语言的动态发展和社会来源,力图从活生生的自然语言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其接触者的具体解读克服语义分析哲学形而上学的缺点,实现对语言意义的真正解读。

### (二) 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对语言学突围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前期是语义分析哲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致力于通过建立某种科学的语言体系,以克服自然语言导致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实现数理逻辑所需要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然而,随着20世纪各种构建完美无缺的人工语言体系努力的失败,维特根斯坦逐渐认识到将逻辑科学作为哲学基本研究对象存在的错误。哲学的任务并不是仅仅对各种科学理论通过逻辑进行语形和语义的分析,从而揭示世界具体的逻辑结构,其研究对象还必须包括数理逻辑所代表的科学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无法使用科学而精确的数理逻辑方法用来描述的社会领域。因此,维特根斯坦后期认为哲学真正的任务是无法通过科学而精确的人工语言来完成的,而必须回到对人类所有领域的意义都能进行表达的自然语言。现代哲学的任务应当是对自然语言如何使用的语法规则进行研究,研究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用法,并据其确定相应的语义。通过对人工语言局限

性的认识和对自然语言及与之相结合的具体语境的强调,维特根斯坦实现了其后期的语用学转向。

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哲学抛弃了语义分析哲学试图从科学逻辑的角度探讨语言的本性并通过语言的表象精确表达语义的分析方法,而是通过语言的实际使用来理解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语义,并由此提出所谓的“语言游戏论”,认为语言只有在实际使用,也就是“语言游戏”中才具有实际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应当是对现有世界的阐述,其发展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哲学的手段,比如创造出一种完美无缺的人工语言的方式对世界进行干预和改造,语言的发展自有其意义和规律,对语言学的研究应当是尽量去发掘这些意义和规律,并以此为语言的实际使用的指导。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他完全改变了探讨语言本性和语言表象的方法论策略,提出“语言游戏论”来重新定位语言性质和语言功能,使用语用分析来理解语言使用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于语用层面。在语用层面上,并不存在语言之外的意义实体,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sup>[8]</sup>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使语言学从语义分析哲学仅仅从语言的语形和语义的层面对语言进行研究,从而陷入同现实的语言使用世界脱节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使语用学成为语言研究的主要方向。

### (三) 哈贝马斯的语用学对语言学突围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致力于构建对人类行为进行全面解释的系统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对哈贝马斯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最为系统的诠释。《交往行为理论》通过对主体在社会中的行为类型的研究,指出人类行为分为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流行为四种。而语言只是人类四种行为之一的交流行为的中介,交流行为的目的是实现交流的对象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语言则是实现这种交流的工具。<sup>[9]</sup>哈贝马斯认为应当通过研究语言运用在具体环境中的意义,恢复语言在“交流行为”中的中介地位,才能真正发挥语言在人类交流行为中促进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作用。哈贝马斯力图创建某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并将其命名为“普通语用学”的语言分析方法。<sup>[10]</sup>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在人的四种行为中,无论是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还是戏剧性行为,都会因为其他利益因素的影响,而使相应行为同主体的真实意图产生偏差,只有交流行为不受其他利益因素的约束,才能真正使主体的行为同其意图一致。因此,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沟通和理解,只有通过适当的交流行为才有实现的可能。

哈贝马斯的语用学转向力图创建某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这一规范同理想化的人工语言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哈贝马斯理想中的人类共同接受的语言使用规范来源于现实中使用的自然语言,其基础建立在对语言运用在具体环境

中意义考察的基础上,克服了语义分析哲学的人工语言建立在纯粹的逻辑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同社会现实脱节的缺陷,从恢复语言作为交际行为的中介的角度实现了语言学从语义分析哲学困境中的突围。<sup>[11]</sup>

综上所述,传统的语义分析哲学为了克服自然语言存在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从而致力于按照数理逻辑的要求创造出某种科学而精确的人工语言。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的创造规则是数理逻辑,因此其事实上更为倾向于科学领域意义的表达,而没有考虑其在其他人类领域的运用,因此其事实上同样具有自然语言所具有的价值倾向的问题,从而陷入语言观上的困境。而且,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语义分析哲学其语言表达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而对无法适用数理逻辑进行科学而精确描述的社会领域无能为力,因此在方法论上存在致命的缺陷。为了克服语义分析哲学存在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的困境,以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哲学家,分别代表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的传统,通过对语言分析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实现了对语言学的突围。其中维特根斯坦按照英美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通过对人工语言局限性的认识和对自然语言及与之相结合的具体语境的强调,维特根斯坦实现了其后期的语用学转向。而哈贝马斯则按照大陆哲学的理想主义传统,力图创建某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其基础建立在对语言运用在具体环境中意义考察的基础上,克服了语义分析哲学同社会现实脱节的缺陷,实现了语言学从语义分析哲学困境中的突围。

### 三、语用学转向对语言学突围的具体作用

在语用学转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语言哲学,已经形成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三大分析方法,并以语用分析为主,以方法论的方式渗透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按照语用学的思维,将语形语义以及语用分析整合起来,对传统哲学问题进行新的解释,使语用学转向给哲学带来了真正的改变,也使语用学转向对语言学突围产生了一系列的具体作用。

#### (一) 科学解释模型的动态语境化

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对某一客观现象进行科学解释。与语义分析哲学对逻辑科学的依赖相对应,传统上居支配地位的科学解释模型是所谓的“演绎——规律”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对客观现象的解释被认为是一种陈述上的逻辑关系,即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只要通过这种解释进行演绎能满足相关性和可检验性要求,这种陈述即被认为是一种规律,即科学解释,而不用考虑具体的语境即语用方面的问题。<sup>[12]</sup>这种模型存在的问题是,所有的客观现象只有纳入某一规律之下才能得到所谓的科学解释,但事实上,特定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均有其特殊的情况,因此在解释时必须考虑其具体的语境,这就与规律的不可或缺性以及预测的严格对称性产生了矛盾。

为了克服“演绎——规律”这一科学解释模型忽视具体语境而产生的问题,人们由对普适性规律的追求转向对特定现象和个案的描述,从统计解释具有的

规律性和相对性的双重特点,论述构建新的科学解释模型的必要性。这些新的解释模型虽然缺乏传统上的“演绎——规律”模型的强大影响力,但均认为不可能存在某种不依赖于解释所存在的特定语境的客观科学的解释。因此,任何成功的科学解释模型必须考虑到科学进步的动态因素,客观的科学解释只能存在于不断发展的动态语境之中。<sup>[13]</sup>科学解释模型的动态语境化以重视具体语境的语用学转向为语言学上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突围在科学解释领域的具体表现。

## (二)指称理论的语境化

指称理论研究是语言及其代表的客观实在之间的联系,即具体的语词在现实中的映射或对应的关系。语用学的转向因为对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的强调,从而使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理论背景的转变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变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绝对确定性向相对非确定性的变化。传统语义分析哲学要求指称对象具有绝对确定性,即某一具体语言只能对应某一绝对确定的客观实在。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讨论其实际的指称对象。另一方面则是从对语义的微观分析向整体语境分析的变化。正是因为语义分析哲学认为绝对指称对象的存在,因此只需通过对词汇语法等语言的微观结构进行逻辑分析,即可以准确地演绎出语言表达的实际意义。但事实上,具体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语言的微观结构之中,还需要根据整体的语境才能准确阐述其具有的真实语义。

因此,语用学转向对指称理论语境化的影响,其根源在于传统语义分析哲学对指称理论的基本假定的错误。语义分析哲学认为语言的指称关系应当符合逻辑科学规律,因此其指称对象具有逻辑科学的绝对确定性,从而忽略了语言使用必然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具体的语义必然受到特定语境的影响从而具有相对不确定性,必须在整体语境下才能对语义进行正确阐述的事实。语用学转向对语义分析哲学在指称理论上存在错误的克服,是对语言学突围的又一重要作用。

## (三)真理观表达的实用化

传统真理观的表达符合科学逻辑要求的简洁性和准确性,即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也就是说,语言表达和现实存在之间存在绝对确定性,两者具有严格的一致性。但是,因为传统哲学对指称对象要求的绝对确定性受现实中具体语境的影响而不复存在,这种绝对的真理观同样受到语用学转向的冲击,从而在真理观表达方面对语言学突围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语用学转向对真理观表达的影响来源于语用学产生的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认为真理应当同其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实效联系起来。即认为凡是在现实中应用能产生正面作用的表达即为真,反之为假。因此,所谓真理必须同具体的现实,即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而由于具体语境的不断变化,真理观的表达也需要根据具体语境的变化而变化。<sup>[14]</sup>这种语用化或者说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突破了传统语义分析哲学对真理观表达的静态理解,使真理成为必须适应语境变化的相对真理,克服了传统真理观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的局限。



#### (四) 意向研究的社会化

语义分析哲学对心理意向性的研究以指称对象的绝对确定性为基础,因此着重于从表示心理意向性的概念入手进行分析,力图通过对概念本身的研究,寻求心理意向的一般规律,从而获得解决意向性问题的科学方法。

但是,语用学转向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纯粹的科学逻辑理论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从语言的角度对人类心理意向进行研究也必须考虑到语言的社会因素,亦即使用语言的具体语境。语用学转向要求对语言心理意向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词和结构所体现的语义方面,而必须将其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同具体的社会文化特征相结合的语言心理现象。因此,语用学转向促使语言心理意向研究的社会化,是其对语言学突围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

#### 四、结 语

语用学转向源自于语义分析哲学的缺陷导致的哲学和语言学上的困境,这一困境的产生源自于语义分析哲学对逻辑科学的过度依赖。语义分析哲学力图建立某种独立于具体的社会现实的自洽的精确人工语言,以克服自然语言的歧义和含糊的缺点。但事实上,语言诞生于社会实践之中,其具体意义并不是纯粹的逻辑科学可以完全涵盖,因此陷入了脱离社会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困境。语用学转向即通过强调具体的整体语境对语义分析的影响,克服了语义分析哲学的局限性,使语言学成功地从语言分析哲学的困境中突围。

#### 注释:

- [1] 崔凤娟、苗兴伟:《语用学的哲学维度》,《外语学刊》2007年第4期。
- [2] 吴肃然:《论操作化: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启示》,《社会》2013年第5期。
- [3] 董琳:《语用学与哲学》,《卷宗》2014年第9期。
- [4] 殷杰、何华:《语言与理解——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语言转向”及其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 [5] 李国山:《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 [6] 崔凤娟:《日常语言哲学视域中的语用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7] 曾文雄:《人文性与科学性的融合: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
- [8] 殷杰:《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用学的构造》,《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 [9] 罗建平、王亚萍:《理性破裂与世界重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评析》,《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 [10] 殷杰、郭贵春:《理性重建的新模式——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的实质(上)》,《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3期。
- [11] 殷杰、郭贵春:《论哈贝马斯“语用学转向”的实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3期。
- [12] 成素梅、郭贵春:《论科学解释语境与语境分析法》,《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2期。
- [13] 李雅琴:《科学解释的语用学转向研究》,华南师范大学毕业论文,2008年。
- [14]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语用学转向——当代科学“说明”问题的消解》,《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弘 亭]